

范·弗拉森后现代反实在论的方法论演变

郭贵春 胡瑞娜

提要 二十世纪哲学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随着“语言学转向”的展开以及解释学传统和现象学传统的广泛深入,哲学研究的重点转向了方法论。本文从后现代反实在论的视角,揭示了范·弗拉森作为当代科学哲学领域的重要代表人物,其方法论经历了语言学、现象学和解释学三个阶段的演变,同时鲜明地体现了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英美哲学与欧洲大陆哲学的融合。正是这一特征,实现了他反实在论方法论的后现代“圆融”。因此,具体分析和研究范·弗拉森的方法论意义,对于把握整个后现代反实在论的方法论,并站在这个层面去看待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方法论具有深远的意义。

二十世纪哲学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随着“语言学转向”的展开以及解释学传统和现象学传统的广泛深入,使得整个哲学尤其科学哲学研究的重点由本体论、认识论转向了方法论,同时也促成了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英美哲学和欧洲大陆哲学的相互渗透和融合。而始于本世纪中叶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从某种意义上讲,其特征正是一种本质的方法论性的演变。范·弗拉森作为当代反实在论阵营中的重要代表人物,其后现代方法论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特征。因此,具体分析和研究范·弗拉森的方法论意义,对于把握整个后现代反实在论的方法论,并站在反实在论的立场看待整个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甚至整个后现代科学哲学的方法论演变,具有深远的意义。

1 后现代反实在论的语言学方法

在人类历史上任何一种独具特色的文化中,“语言是最切近于人的本质的。”^{〔1〕}它不仅具有一种沟通人们的心灵的共性,而且在其使用中又必然地被赋予某种特定的个性。因而,人类对语言自身的思考和研究代表着哲学自身进步的水准。发于本世纪初的“语言学转向”突破了以往语言本体论框架的局限,使语言作为一种重要的方法论突现于整个科学哲学的研究领域,并试图通过对语言形式的句法结构和语义结构的逻辑分析,去把握隐含在语词背后

的经验意义;另一方面,本世纪中叶兴起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作为“一种反科学主义的‘理智运动’,一种新的‘文化经验’”^{〔2〕},又将语言学方法渗透于整个人文主义哲学、心理学以及艺术等各个方面。这就促使语言学方法成为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两大思潮在后现代视野中全新的融合点和生长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范·弗拉森把语言学作为一种方法论引入自己的哲学体系,并以深嵌后现代特性的“整体论观念”为前提,构成了他的后现代反实在论的语言学方法。

(1)从句法学的解构到后现代整体语义分析方法的建构。范·弗拉森反实在论的重要理论即他所建构的“构造经验论”,其核心任务就是要“拯救现象”。正是在“拯救现象”的过程中,他清晰地看到句法学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所存在的“战略性”的缺陷。于是,他通过批判逻辑实证主义对意义的解释,而直接走向了后现代整体语义分析方法的构造和设定。历史地讲,正是逻辑实证主义对意义解释的失败直接导致了语义整体论的产生,因为这种解释恰是以“证实原则”为前提且反整体论的。根据这种原则,如果每一个句子都有它自己唯一的证实经验,那么特定语言中的每一个句子均可在仅仅给予证实其单个句子经验的前提下,独立地得到解释。但是,在范·弗拉森那里,诸多句子被证实或被合理地判定,不仅仅在于其特定经验的存在,而是因为它们处于

与其它已被证明为真的语句的推理关系之中。也就是说,“一个理论的经验意义不能在句法上被割裂”^[3],而应该处于证明或合理判定它的整体语境之中。这样,在“后现代”趋向的大语境下,整体论的思想内在地与语义分析方法结合在一起,成为范·弗拉森反实在论的一种合理有效的方法论。从总体上讲,其后现代整体语义分析方法的特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整体论与非决定论、概率论的统一。范·弗拉森在考察、分析量子理论时发现,该理论最显著的特点也许就是它的整体论性。对这一特性他做了这样的描述:“当一个系统复杂时,部分状态并不能决定整个状态将会是什么。这与它的概率特征并不是没有关系。”^[4]可见,在他看来,整体性观念与非决定论、概率论是相一致的。部分状态对整体状态的非决定性恰恰体现了整体观念的内在性,而非决定性则与概率论是直接相关的,因此,整体观念必然地体现在概率论中。在他看来,整体论思想的出现并非偶然的、一蹴而就的,而是有着其历史的渊源。在古典概率理论中就已经存在有鲜明的整体论特征,随着“后现代”运动的到来,这一特征在多数具有后现代倾向的哲学家的理论著作中再现出来,并发挥着它的独特作用。正是基于这一背景认识,范·弗拉森把整体论思想引入语义分析之中,强调语义分析方法在后现代语境中的非决定性和概率性,从而适应其理论解释的经验适当性,而不是确定性和决定性。

语义分析方法的优先性与必要性。范·弗拉森在其早期著作中曾过分地强调现代逻辑的成就,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必须承认,一开始我也曾被现代逻辑的某些成功所强烈地吸引”^[5],因而对句法学有所倚重。而后他认为,“理论的句法学和语义学特征之间的相互关系,使得宣称这两种方法中任何一种具有哲学上的优先性都是令人难以置信的。”^[6]但是,由于句法学方法本身所具有的局限性以及它所带来的解释的狭隘性,使得范·弗拉森看到语义学分析方法作为一种内在的、横断的理论研究方法,它不可避免地要优越于句法学方法而存在。因为,如果以逻辑为起点,当我们通过给某类模型下定义来展现一个理论时,从一般意义上讲,这类结构就不可能等同于任何“一阶语言”(first-order language)的基本模型类。也就是说,当我们研究、阐释和构造理论的逻辑模型时,“存在着不可避免的技术误差。而

运用语义学方法则会比公理化方法有着更广阔的分析空间”^[7]。因为,“语义学方法(较句法学)更接近于科学且具有较低程度的抽象性,这种优越性是非常明显的。”^[8]正是由于上述洞察,范·弗拉森更倾向于语义学分析方法,强调了语义分析在理论解释、评价中所具有的不可或缺的意义。

自然主义语言是范·弗拉森后现代整体语义分析方法的核心。“20世纪自然主义的演变历程表明,自然主义需要借助于一种语言学或语言理论的形式得以生存,而一种特定的语言学或语言理论又藉自然主义为其逻辑的出发点”^[9]。正是在这一意义下,范·弗拉森吸取了奎因的自然主义,以整体论为其原则基础,强调“推进自然语言概念”^[10],强调构造整体的自然语言的适当模型,从而形成了以自然主义语言为核心的后现代整体语义分析方法。

(2)走向后现代语用分析方法。在范·弗拉森构建以自然主义语言为核心的后现代整体语义分析方法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敏锐地看到,这一过程事实上已蕴含了其方法论走向语用分析的基本生长点。它鲜明地显示出范·弗拉森在对后维特根斯坦哲学强调“语用”分析为主的分析哲学的继承和发展中,其方法论后现代演变的必然趋向。同时,对新实用主义的接纳,也表明了他在与科学实在论的激烈争论中,其方法论建构以“开放”、“弱化”的特征显现了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大陆哲学与英美哲学相融合的成熟的结合点。从总体上讲,其后现代语用分析方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语用分析方法具有鲜明的整体论性和实践性。尽管范·弗拉森在后来赋予语用分析方法以最优的地位,强调语用分析是对语义分析的超越,但是,他构造经验主义的本质要求,就是要在经验的基底上以经验适当性去消除逻辑经验主义的纯句法学方法和科学实在论的纯语义学方法,反对将句法学、语义学与语用学分离开来。一方面,他将科学哲学从数学基础的关联和方法中解放出来,主张科学理论模型不仅是关于理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更重要的还是理论与其使用和使用者的关系以及“有用性”的问题,即理论模型的实用问题。这必然会超越对“一致性”、“经验适当性”和“经验力”(empirical strength)的追求,而诉诸于“解释力”(explanatory power)、“简单性”(simplicity)、“完美性”(elegance)。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引入语用分析方法,并将它置于

高过其它方法的地位。另一方面,他又强调整体语义分析的自然主义语言就恰恰“存在于玩各种不同的语言游戏时所拥有的空间中”^[11],于是,在整体论、语义分析以及语用分析方法之间便产生了一种必要的张力,它们相互渗透、相互依存,而非此消彼长。在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语用分析不仅可以给出一种有理由的语言实践,更重要的还在于它通过将科学理性与非理性的“实用”结合起来这条途径,由经验的适当性走向了对理性权威的消解和批判,从而体现了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的融合。

语用分析是以语境为基底的公共实践方法。在范·弗拉森看来,语用分析在本质上是一个揭示语境本质的过程。因为无论是在构造理论模型还是在玩各种不同的语言游戏时,我们都必须遵守某种语言游戏规则。正是在这种特定的语言游戏规则中,恰恰体现了语用分析与语境结构之间不言而喻的趋同性。而且,一般说来,言说行为作为由此种语境进入别种语境的功能,它所表达的命题,将随着使用的语境和场合的变化而变化;并且,对其所蕴含的具体特征的选择,同样是语言的、文化的和社会的背景选择,而这种选择只有通过语境的作用才能得以实现。所以,只有以语境为基底去构设语用分析的方法论性,才能由语用个体论走向整体论的语用分析,消除语用个体论由于私人语言的使用而导致的困顿,使语用分析方法走向公共实践。事实上,正是“语境”这一基底,消除了纯语言形式的束缚,从而在经验的意义上,在“拯救现象”的过程中,范·弗拉森以语形、语义、语用分析方法相结合的整体形式,走向了他所构建的后现代反实在论的现象学方法。

2 后现代反实在论的现象学方法

历史地讲,现象学作为一种方法与后现代主义趋向在科学哲学研究中的契合,始于语言学方法在科学哲学研究中的局限性。一方面,后现代主义高举反基础主义、反本质主义、反表征主义、反理性主义的大旗,向所有传统范式下共同遵守的元科学纲领发动猛烈的批判;另一方面,现象学从否定性的视角出发,将一切与超越物有关的判断搁置起来,使语言学方法的有限性突现出来,批判“语言学转向”所带来的极端性,从而在“超出语言而通向语言的非语言性条件的运动”中^[12],使现象学作为方法论在后

现代状况下得以展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范·弗拉森将现象学方法引入科学哲学研究中,实现了由后现代反实在论的语言学方法到后现代反实在论的现象学方法的转向,同时也鲜明地体现了现象学方法在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大陆哲学与英美哲学之间相互融合中的中介作用。

(1)吸纳“超越语言形式”的现象学方法。胡塞尔创立的现象学是一个以意向运动为框架,以超越语言形式的约束为方式,以具体的还原方法为核心,以重建和贯彻本质的意义理论为目的的唯理主义的哲学体系。但是,在胡塞尔那里,现象学不仅仅是作为本体论而存在的。如果透过这一体系的艰深而又晦涩的思辨和唯心主义的帐幔,我们会发现它存在着一系列合理的、有益的方法论思想,因此,它作为一种方法论而存在具有更重要的意义。胡塞尔曾经极其明确地指出:“现象学:它标志着一门科学,一种诸科学学科之间的联系;但现象学同时并且首先标志着一种方法和思维态度:典型哲学的思维态度和典型哲学的方法”^[13]。范·弗拉森正是从胡塞尔现象学的方法论这个角度来实现其方法论的后现代演变的。而他之所以在语言学方法之后转而经由现象学方法的途径去解释和构造科学模型,则是由20世纪语言学发展中自身所具有的限制性以及现象学方法的内在特点和要求所决定的。

首先,范·弗拉森在批判逻辑实证主义时指出,逻辑实证主义者在试图把哲学问题转变为语言问题方面,过份地强调了语言的重要性,认为全部哲学归根到底都是关于语言的问题,把语言学方法看作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唯一方法,从而走向了极端。事实上,语言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自身必然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这就在于:

语言形式的有限性。这包括语词数量的有限性,语法规则的有限性,以及语言含义的有限性等等。这种语言的自限性决定了语言的一切可能表征空间的限定性。

语言与情感、心理状态及体验之间存在着差异与距离。不仅常识肯定了语言表述情感的有限能力,诸如“难以言状”等等;而且,心理学与精神分析学也对意义可在语言之外的体验中发生这一点作出了富有启示的说明。

语言描述的不完整性。语言所描述的对象的存在与变化,是在三维的共时状态中存在的,而语言

表征的一维性,却使语言在任一时刻只能展示对象的某一方面。因此,对象的整体共时存在状态,在语言描述中实际上被解构。

语义蕴含的有限性。语言在使用时,至少会出现两个参照系,即语言的自身系统和语言的对象系统。语言系统作为参照系,确定了语词意蕴的内涵与外延;同时,语言又是在表达和描述特定对象,因此具有给定的指称物。这样一来,语言的意义就必然受到两个参照系统的制约,从而造成了语义蕴含的有限性。

正是语言自身所具有的这些局限性,使得范·弗拉森不得不转换视角,重新寻求一种超越语言形式的研究方法。

其次,现象学方法的本质特性恰恰适应了范·弗拉森构造科学理论模型的需求。历史地讲,现象学在胡塞尔之后经历了一系列的演变和分化,但是,无论怎样变化,它们始终都具有两点共同的特征:第一,强调人的思想直接面对事物本身,而废除在人的原初意识与事物之间业已存在的一切(作为“中介”的)传统观念的障碍。第二,现象学在其本质上来说,是反传统的。因此,随着现象学的扩张,这种反传统的思想和方法越来越鲜明地显示在大陆和英美分析哲学的发展中。范·弗拉森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一趋势,并且正是基于这种洞察,他试图把现象学方法培植成重解哲学的手段和途径。

以上这些因素,促成了范·弗拉森避开语言形式的束缚,而转向了“超越语言形式”的现象学方法。但必须指出的是,他之所以选择现象学方法,并非单纯因为现象学方法超越了语言的形式;更重要的还在于,现象学方法是“作为使整体的语言与领悟在语言中得到表达的现实的方式联起来的尝试”^[14]。因此,范·弗拉森试图在经验基底上,在语用层面内,在语言的逻辑意义及其相关的同一性和一致性的要求下,识别出现象学的意向功能,并通过这种功能体现出语言与现象学之间的必要张力。因为,只有这种张力,才能显示出语言在现象学研究中的方法论意义。就这样,范·弗拉森自然而又必然地走向了后现代“语用层面”上的现象学方法。

(2)后现代“语用层面”的现象学方法。后现代“语用”概念突破了把科学语言仅仅看作是对理论与世界之间二元对立关系的描述,而强调了理论、世界与使用者之间的多元关联。这标示出后现代性的多

元说明以及科学研究中心理意向性的不可或缺地位。因为,既然理论说明涉及使用者,那么就必定要涉及到使用者的心理状态,而这恰恰与现象学所强调的意向性特征不谋而合。因此,这一语用化的要求使范·弗拉森提出,要在语言的语用分析层面来研究现象学方法,以使“科学的现象学能够适当地在语言的语用分析中进行探讨”^[15]。可见,范·弗拉森的现象学是建立在语用分析之上,具有较强后现代性的方法。其后现代性表现在如下方面:

语用构成了现象学方法的基底。从具有“超越语言形式”特点的现象学方法到具有强后现代性方法论的转变,使得语用分析已作为整体论观念和行为集合的特定基底出现了。在这种带有很强后现代性的语用分析方法的建构中,范·弗拉森试图通过现象学的途径,克服语言的局限性,从而为科学研究开辟广阔的可能分析空间。因为,一方面,语言不是在意向运动之前出现的,也不是独立自足的,它仅仅是意向运动中的某种表征手段;另一方面,语言又永远是意向运动的媒介,它自身对于前语言存在的依赖关系,也必须通过这种媒介关联得以体现。这便使得语用能够在语言与意向运动的矛盾对立中寻找自身的合理存在地位,摒弃语言与现象学之间传统的僵化关联。正是基于语用分析所展示出的这种方法基底的合理性,范·弗拉森力求在整体论特性上,在语用的基底上,去实现语用分析与现象学的统一,将二者融为一体,为方法论的重新建构寻找到了合理存在方式,从而在语用结构自身中去把握更深层的意向功能,以探索普遍的科学理论模型。

语用现象学是以经验为基底同时又超越经验的方法。范·弗拉森的构造经验论始终强调把经验作为其理论基底,认为只有在它的基础上才能“拯救现象”。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意识到,“单纯的经验描述是有限的。因为,如果没有余项(remainder),物理论就不可能被翻译成只描述可观察现象的一系列陈述,而即使这些论证起作用,经验主义也不可能合理解释科学”^[16]。所以,只有使经验的适当性与它对现象的超越成为一致的和必然的,才能够达到这一目的。没有超越,也就没有拯救。也就是说,必须以经验为基底同时又超越经验,并以此来澄清视界,才能达到哲学的真正理解,从而最终拯救现象。因为,现象学方法不在于“创造”,而在于“发现”。这就使得对现象的理解成为意向运动中的经验说明,而

说明的对象则是意向经验的结构。在这里,只有把对意向经验的说明与哲学理性意义的揭示结合起来,才能获得完整的、赋予本质的方法论意义。

心理意向分析是语用现象学方法的根本特征。心理学本身就是一门经验科学,根据“经验”一词的通常意义,心理学是一门关于事实或者休谟意义上的事实的科学。基于此,范·弗拉森强调在科学研究中心理状态的重要性,认为特定的科学事实“可能包括心理状态的部分,因为这些部分涉及到对理论的沉思”^[17]。同时,他之所以把心理意向性看作语用现象学方法中最重要的特征,是因为语言的方法论意义不是孤立地存在的,语言的意向态度是与意向运动密切相关并在这一运动中获得实现的。只有在意向运动中,语言才能从语形、语义和语用的一致性上与具体的指称物联为一体,从而展示语言对意向经验的描述。

不言而喻,范·弗拉森的语用现象学方法正是以经验为基础,在语用基底上,实现了其方法论的后现代转变。他将意向运动引入科学哲学,把语用分析与现象学方法结合起来,使后现代性的分析方法在语言哲学和现象学的融合中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但是,不容忽视的是,这种语用现象学方法在某种程度上会使人沉迷于对直观和绝对给予物的追求。因为,现象学的基本方法便是本质直观与本质还原,前者会导致使自己困顿于纯直觉主义,而后者则会导致对绝对真理的盲目企盼,而且两者中无论哪一方都有可能走向本质主义,这与后现代精神又恰是完全相悖的。因此,范·弗拉森为了避免后现代语用现象学方法所带来的上述种种缺陷,最终走向了全新意义上的解释学方法。

3 后现代反实在论的解释学方法 ——“语境化”的语用解释学方法

随着“语言学转向”之后“解释学转向”的深入开展,解释学越来越作为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一种横断的研究方法,像一座理性思维的桥梁,成为当代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这两股思潮之间相互渗透和融合的媒介。它不仅突破了“语言学转向”所导致的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社会科学哲学与自然科学哲学之间的僵化界限,而且还促成了语言理解与解释经验、语言分析与解释实践的相互渗透和融合。另

一方面,尽管现象学方法与解释学方法之间也存在着某些不可逾越的鸿沟,但它们之间还有着更重要的共同的亲近关系,这种关系表现为:一是解释学的基础就是现象学;二是现象学只有在“自我”经验的“解释”中建构它自身,才能实现其“建构”纲领。正是基于以上的洞察,范·弗拉森选择解释学作为其方法论构建的趋向,使它既能够体现出其后现代语言学方法的特性,同时也能够展示出其后现代现象学方法的特性及功能。

通过对语义分析方法的引入,范·弗拉森已使解释学方法与语言的关联从表层句法形式进一步深入到了深层的语义结构。然而,后现代“语境”概念与语用分析方法的广泛渗透,更为解释学方法脱离狭隘的思辨域面,进入一个广阔的与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相关的新视界开辟了可能空间。正是从这一全新的角度出发,他把句法的形式结构的分析、本文的深层语义的结构分析以及对语言的使用和使用者在语境基底上结合起来,强化了解释学方法的整体性、相关性和一致性,促成了解释学在方法论上的多样性,同时也推进了整个西方人文主义思潮与科学主义思潮之间在方法论上的相互渗透和融合的可能趋势,从而在科学哲学研究中,实现其后现代反实在论的解释学的建构。在这一建构中,我们可以清醒地看到,他所选择的通向解释学方法之路,包含了走向语用分析和“语境化”建构趋势的基本生长点,从根本上说,其反实在论的“语境化”的语用解释学的后现代特性就在于:

满足了从全新视角对传统“解释循环”难题进行重新解释的迫切要求。在范·弗拉森看来,传统“解释循环”的核心问题,就是解释与理解必须先由部分开始,而要理解部分,又必须首先理解整体。因为部分只有在整体中,才具有获得意义和理解的可能,而解释和理解又只能从部分开始。具体来说,理论描绘了整个世界图景,科学本身则仅仅把这个图景中的特定领域看作是可观察的,科学家在接受理论时就只能断定这一特定领域的图景是准确的。所以要接受这一理论,就必须首先相信可观察现象是正确的。但是,离开整个世界图景,就无法相信可观察现象;而离开可观察现象,又无从把握理论的整体意义。解释似乎陷入了一种逻辑上的“恶性循环”。范·弗拉森认为,之所以产生这一难题,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脱离了具体的语境以及理论与人的关系

即语用分析。在他看来,“无论是理论评价语言以及具体的‘解释术语’,还是用于解释现象的理论使用语言都是从根本上依赖语境的”。^[18]因此,范·弗拉森站在“语境化”基底上的语用解释学方法的立场,“将浸入科学语言或科学世界图景的这类概念置于语用空间当中”^[19],从而在语用与语境结构的趋同中实现解释者与本文之间、解释者之间的对话,以最终获得完整的意义。这样一来,便经由“语境化”的语用分析途径合理有效地达到理解进程中的所有部分与整体的和谐,使“解释循环”难题在某种程度上得以适当地求解。

“隐变量解释”(h. v. interpretation)是“语境化”的语用解释学方法的典型内容,它提供了适当阐释量子力学理论的方法论基础。量子力学的发展无疑为整个科学哲学的研究提供了合理的实证依据。但是,另一方面,如何对量子力学理论进行合理的解释,在当前仍然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针对这一现象,范·弗拉森根据“隐变量”内含了语用与语境因素在其中这一特性,将其作为解释学方法的典型内容。在他看来,“要进行解释就必须引入‘隐变量’,或者构造一个属于量子力学的隐变量理论”。^[20]同时,一个适当的解释必须是具有“经验多余性”(empirically superfluous)的隐变量的隐变量理论”。^[21]看起来这似乎有些矛盾,但实际上,恰恰在这种似非而是的悖论中,量子力学理论获得了适当的说明。在这里,“隐变量”就相似于隐喻,它不需要告诉我们任何新的东西,而只需作为一种修饰量子力学理论的“修饰装置”,在特定的语境中以语用分析而达到完美的解释,即从“隐变量”回到全新意义上的量子力学理论。也就是说,通过“隐变量解释”,可以产生出与量子力学本身完全等同的预测。因为,理论加“隐变量解释”在逻辑上要比理论本身更强。^[22]这样,“隐变量”的解释为量子力学理论的全面展开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分析的视角。

体现了解释学方法的实践定向。范·弗拉森从后现代视角出发,不仅强调了科学解释中所存在的心理意向性及其所内含、引导或应用于的特定语境中的意识主体与理论的关系,而且揭示了解释及其解释对象在具体语境中获得自身具体化的可能性以及解释的目的性内涵于所有的解释境遇中。这样,实践性必然地蕴含于其解释学方法中。具体地讲,在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相融合的过程中,范·弗

拉森以“语境化”的语用解释学为其方法论集合,扩展了解释的域面 and 解释力,并使传统的“解释难题”——“解释的不对称”和“解释的拒绝”问题得以解决,从而强化了解释实践与解释理论的相关性,保持了解释实践与科学行为的一致性,同时也强调了解释实践与背景语境的统一性。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范·弗拉森所构建的后现代反实在论的解释学方法是建立在实践之上同时又构成实践自身的。它在本质上不仅体现了科学、心理、文化与实践的趋同性,而且蕴含了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相融合的后现代走向。

4 结 语

无论如何,范·弗拉森的后现代反实在论的方法论构建是在经验基础之上,以语境为基底,使语形、语义和语用相结合的方法论。它冲破了传统方法论的桎梏,内在地体现了后现代性趋向的迫切要求。其方法论的后现代特性表现在,它弱化了规范理性对科学活动的强约束,延展了科学理性运动的疆域,开拓了实现科学理性的新方法,将人文主义精神引入科学主义的精神中,把科学的社会化和社会的科学化看作是一致的,从而在科学哲学的研究中,推进了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后现代发展趋势。当然,尽管这一方法论本身仍存在着诸多缺陷,但它作为一种后现代反实在论的方法论样板,对于整个科学哲学领域的方法论研究所起的积极作用,确是不容置疑的。

参考文献和注释

- [1] 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商务印书馆,孙周兴译,1997年版,第1页。
- [2] [9] 郭贵春:《后现代科学哲学》,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9、179页。
- [3] [15] [16] [17] [18] [19] Bas C. Van Fraassen, *The Scientific Imag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54、83、59、58、91、91。
- [4] [20] [21] [22] Bas C. Van Fraassen, *Quantum Mechanics - An Empiricist View*, 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91, P73、243、243、243。
- [5] [6] [10] [11] Bas c. Van Fraaseen, *Laws and Symmet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211、211、212、212。

(下转第50页)

来进行决策,并应用于企业管理;管理过程学派则结合管理实践和管理理论两方面有用的知识,建立一种兼收并蓄的科学理论,并把这些原理用于改进管理工作。七十年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一体进程的加快,世界经济朝信息化、全球化、生态化方向发展,随之也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管理问题。

面对新科技革命引发的效率型管理问题,即建立在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基础上的效率型管理,如何面对小量和个性消费时代,企业管理大师哈默 1990 年率先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文章,倡议美国企业充分利用其电脑及通讯上的优势,将目前的工作流程作彻底检讨,重新设计新的流程,以实现企业脱胎换骨般的改造。这就是被称为“过程创新”的新的管理理论和方法。例如丰田公司的看板管理方式,它彻底改变了在流水线组织中以前向管理为主的管理方式,它以后道工序为管理起点,按照准时生产的要求建立反工序性管理过程。

面对信息革命,特别是 1996 年提出知识经济以来,如何突破法约尔瓶颈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即如何把金字塔式、自上而下、递阶控制的科层组织结构转变为一个自动网络系统,以便把一些小型的团队整合起来进行实时管理。《第五代管理》的作者萨维奇提出:通过建立虚拟企业、动态团队协作和知识联网来共同创造财富。虚拟企业突破了时间和空间限制,它是一种新型企业组织形式,它能把不同地区的现有资源迅速组合成为一种没有围墙、超越时空约束、利用电子手段联系、统一指挥的经营实体。虚拟企业不仅涉及到管理的组织结构问题,而且涉及到产权制度。目前,管理科学与其他科学一道正在寻求因信息技术带来的异质(技术、人员和组织等)、异地且分属不同产权主体的各种资源集成过程中出

现的一系列问题。伴随虚拟企业出现,知识团队和网络系统已不可能限于某一组织内。在网络系统中,企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尊重和重视人的价值;个人也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重视自己的全面发展,终身教育、不断学习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综上所述,管理变革与科技进步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可以说,管理变革就是在吸收科技成果,在解决科技-生产一体化过程引发的问题中实现的,而新的管理理论和方法反过去又推动科技的发展,并不断强化科技的社会经济功能。基于这种认识,我们认为,依靠科学技术,不断研究和解决科技-生产一体化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是振兴我国管理科学的关键。

参 考 文 献

- [1] 参见(美)哈罗德·孔茨,海因茨·韦里克著:《管理学》,第 2 页,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 年。
- [2] 参见(美)丹尼尔·A·雷恩著:《管理思想的演变》,前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年。
- [3] 德鲁克:《从资本主义到知识社会》载(美)达尔·尼夫主编:《知识经济》,珠海出版社,1998 年。
- [4] (美)道格拉斯·C·诺思著:《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第 185 页,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年。
- [5] 参见(美)查尔斯·M·萨维奇著:《第五代管理》,第 223 页,珠海出版社,1998 年。

【作者简介】 徐建龙,淮北煤师院副教授。

邮编:淮北 235000

李 垣,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
副院长、教授、博导。

邮编:西安 710049

(本文责任编辑 王国政)

(上接 28 页)

[7][8] Paul M. Churchland and Clifford A. Hooker, Images of Science,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5, P302, 302 - 303.

[12][14] 保罗·利科:《哲学主要趋向》,李幼蒸、徐奕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年版,第 362、362 页。

[13] E·胡塞尔:《现象学的观念》,倪梁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年版,第 24 页。

【作者简介】 郭贵春,1952 年生,山西大学党委书记,教授。

胡瑞娜,女,1974 年生,山西大学哲学系硕士生。

邮编:太原 030006

(本文责任编辑 马惠娣)